



马略橡树

中西文化论札

金文兵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略橡树：中西文化论札/金文兵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6

ISBN 978-7-308-20021-9

I. ①马… II. ①金… III. ①东西文化—比较文化—研究 IV. ①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25840号

马略橡树：中西文化论札

责任编辑 牟琳琳

责任校对 杨利军 牟杨茜

封面设计 林智广告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34千

版 次 2020年6月第1版 202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20021-9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tmall.com>

总序

温州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历史文脉可以追溯到晚清学术大师、教育家孙诒让先生于1906年创建的温州师范学堂。在百年的历史积淀中，一代词宗夏承焘、戏曲宗匠王季思、经史学家周予同、古文字学家戴家祥、著名作家王西彦、敦煌学专家蒋礼鸿、戏曲学家徐朔方、九叶诗人唐湜等先贤曾在此求学或执教，为本学科铸就了深厚的人文底蕴。

斯文不坠，薪火相传。

进入21世纪以来，本学科广纳天下英才，发展态势喜人。2003年，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两个二级学科及相关的民俗学获批硕士学位授权点。2010年，获批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16年，成为浙江省“十三五”一流学科A类。2017年，学科下属“浙江传统戏曲研究与传承中心”成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A类基地。2019年，与本学科紧密关联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成为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目前，本学科已形成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等5个优势学科方向，戏曲研究、域外汉文献研究、文艺美学研究、汉藏语言比较研究、鲁迅研究、温州文学与文化研究等在海内外学界颇具影响力。其中，以南戏研究为龙头的传统戏曲研究，有力地支持了浙南区域文化建设；域外汉文献和东亚俗文学的对接研究以及汉藏语言比较研究，可以为“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提供重要支撑；以文艺学为基础的审美文化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拓展出语言诗学、神话美学、地域文学、媒介传播等特色方向。

回首来时路，瞻望未来梦。我们编纂本丛书，旨在集中推出一批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或继往开来，或引领潮流，或特色鲜明，打造温州大学中文学科品牌，续写新的历史篇章。

孙良好

目录

第一辑

- 鲁迅的大学讲席经历 / 003
岑寂之中见性情 / 013
前尘旧梦燕自知 / 020
“末路”章氏王朝 / 029
接着说“章太炎与王阳明” / 037
亚里士多德西来 / 048
《十慰》：来自异乡的消息 / 055
伊拉斯谟的普鲁塔克 / 066

第二辑

- 国图周作人英文藏书过眼录 / 081
周作人日记所附录英文书目的人名转写（1917—1921年） / 085
周作人经由伊文思书局所购英文书目 / 113
拆书、鹤鸽及周氏兄弟 / 124
辜鸿铭与维多利亚时代文化 / 133
读《管锥编·太平广记》三题 / 138

第三辑

- 方便之门 / 147

- 霜随柳白，月逐坟圆 / 149
卖花担头看桃李 / 152
《原儒》《说儒》 / 153
无体之礼：超越形式之礼 / 156
吕本中与中原文献之传 / 160
易老庄 / 163
《抱朴子》外篇 / 166
读《明季滇黔佛教考》小记 / 167
真精神 / 169
土旺四季 / 171
绝地天通 / 173
作为大地魔镜的天空 / 175
文学是心学 / 177
乡村与诗经 / 180
仰天 / 182
不曾出大门 / 184
绝代佳人 / 186
大儒的闲气 / 188

第四辑

- 马略橡树 / 193
哑然失笑的深夜 / 196
经院哲学的黄金白银 / 198
渴慕无限 / 200

- 《维特根斯坦传》 / 202
一二三 / 204
遗忘 / 207
知识海洋的刻度 / 209
屋顶上的海 / 212
枇杷熟了 / 214
“标致”人也 / 215
隐在孤山 / 217
西洋的夏布 / 218
格物致知与修辞立诚 / 219
强脱不如善解 / 220
了不起的盖茨比 / 221
西部片与黑帮片 / 223
黑泽明的《梦》 / 225
黄色的幸福 / 226
临终的眼 / 228

第五辑

- 立言“功德”与晚清说“晚” / 231
《国粹学报》及其他 / 232
史语所与史语数 / 234
《古史辨》与《大公报》文学副刊 / 236
《休宁金氏族谱》 / 238
《彭城金氏宗谱》 / 240

《金氏文集》	/ 242
月下江西	/ 244
史学江西	/ 252
《庐山记》与《庐山志》	/ 254
抚学述略	/ 256
答南蛮书	/ 258
复友人书	/ 260
《书林秋草》	/ 261
怀良辰以孤往	/ 263
虚空的宿命	/ 265
圣人情怀	/ 267
一点缅怀	/ 269
德性、美趣与智悟之外	/ 271
Imperfect Understanding	/ 273
封箱记	/ 276
后 记	/ 280

第一辑

鲁迅的大学讲席经历

鲁迅自1920年^①起先后在北京的几所高校兼课，而后南下厦门、广州，当了总计不到一年任期的教授。最终还是选择定居上海，结束了甚为不快的大学讲席生活。这段经历广为人知，不算复杂。但令笔者感兴趣的是：一、鲁迅为什么迟至1920年才开始他的大学讲席生活而且是兼职？二、鲁迅又为什么没有在大学的讲席位置上一直坐下去？

产生第一个疑问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辛亥革命之后，与鲁迅同在日本问学的章门弟子（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朱宗莱等）或所谓的余杭人士（如马裕藻、沈尹默）先后于1913年、1914年进入北京大学。^②初回国内的鲁迅与章门弟子一直保持着联系，在给许寿裳的信中就多次提及为章太炎集资刻刊《小学答问》事宜；而在章门弟子及其他余杭人士进京之后，也频有来往。鲁迅没有趁此时机进入大学而是寄身教育部，只能说另有缘由。二、1917年随着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新青年》的大本营也趁势搬了进来。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加上已在北大的钱玄同，刘半农所谓的《新青年》四大“台柱”，全部到齐。周作人也于该年进校任职。可以说，大学讲席之门再度向鲁迅敞开。

① 本书所涉日期，引文及括注依照原文，正文所述，公历纪年以阿拉伯数字表示，农历纪年以汉字表示，以示区分。

② 陈万雄. 五四新文化的源流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31-37.

正是这两次不无关联的机会，和鲁迅所拥有的章门弟子、余杭人士及《新青年》作者这三重身份，让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增添了不少意味。但真正将该段时间（1913—1917年）稍作比照便又不难发现，这些看似必然的机缘其实统统发生在鲁迅一心抄书辑古时期。鲁迅1912年经许寿裳推荐进入教育部。5月由南京转北京赴任，与许寿裳、钱稻孙交往频繁，日记中常常出现相互“招饮广和居”的记载。再度走出“越中棘地”的鲁迅，心情颇为快慰。而1913—1914年，也就是章门弟子、余杭派涌入北京大学期间，鲁迅的生活又重归沉寂。主要工作除了到部点卯之外，便是抄书辑古。与马幼渔、黄季刚、钱中季、朱逷先等虽然频有应酬，但心若古井，并无他想。

新文化运动前的鲁迅，正如《〈呐喊〉自序》所言，因为《新生》的流产，倍感未尝经验的无聊与悲哀。而他提及的“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①，想必包括回国后三年郁郁不得志的地方教育经历。查阅鲁迅致许寿裳书信：“他处有可容足在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一九一〇年七月十一日）“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善乎？”（一九一一年正月八日）“闭居越中，与新颢气久不相接，未二载遽成村人，不足自悲悼耶。”（一九一一年闰六月初六日）^②

初回国“未二载”，鲁迅便经历了杭州师范、绍兴府校两度失意的教习生活，教书职业也终究沦为“变米肉”的谋生手段。他致信许寿裳：“师范收入意当菲薄，然教习却不可不为。”（一九一一年二月初七日）何谓“不可不为”？同信又云：“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使二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已如是，颇自闷叹也。”显然，两年前的鲁迅是耻于言“米肉”的；两年后的鲁迅这么说了，足见他对地方教育的

① 鲁迅. 鲁迅杂文全集 [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129.

② 鲁迅. 《鲁迅书信集》: 上、下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5, 8, 12.

失望。鲁迅到底失望于什么？同日信中，有如下注脚：“绍兴府校教员，今年颇聘得数人，刘楫先生亦在是，杭州师校学生则有祝颖……，是数人于学术颇可以自立，然太氏憧憧往来吴越间，不知何作。今无一存者。”人才的相继流失，使得鲁迅对于此间教育现状失望之极。他致信章廷谦：“夫浙江之不能容纳人才，由来久矣，现今在外面混混的人，那一个不是曾被本省赶出来？”（一九二七年，七，二八）再一次重申了他对当地教育的不满。可以说，正是这近三年不甚如意的地方教习“碰壁”生活，构成了鲁迅离开浙江以及卜居京城专心抄书辑古的心理基础。既为抄书辑古，在哪不都一样呢？哀莫大过于心死，对于一个只想埋身故纸堆与碑石当中的人而言，“然以饭故”，也就沉寂地活着。

而后，随着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新青年》的主将相继进入北京大学，周作人也来了。但鲁迅似乎依然不为所动。他致信许寿裳：“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六日）可见一直到发表《狂人日记》的次年和终于兼课的头一年，鲁迅对于“太学堂”的前景也并不怎么乐观。后来尽管还是做了“教一两点钟的讲师”，但正如《我观北大》中所声明的，“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①。此文作于1925年，是为北大二十七周年的纪念而写下的文字。时值章士钊出掌教育部，大搞“整顿学风”，使北大的改革务新呈现“勒转马头”之势。所以，借着这篇“命题作文”，鲁迅还是站出来为北大说了好话。北大之于鲁迅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新的精神，除却了这种新精神，他在里面就只是一个没有名分可言的兼职讲师而已——这与他以沉寂之心做官、抄书又有何区别呢？鲁迅本人无意于“太学堂”教职，看来是很清楚的事了。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琐屑的因缘》中，也一语道破了鲁迅“兼课”大学的偶然性。

这里面有个细节当值得注意，马幼渔早自1913年进京，常与鲁迅有走动，

^① 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179.

这在鲁迅日记里多有记载。如果鲁迅有意谋求讲席，当轮不到做弟弟的来让梨。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中也谈道，“豫才对于古小说虽然已有十几年的用力，（其动机当然还在小时候所读的书里）但因为不喜夸示，平常很少有人知道”^①。这倒是实情。“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的鲁迅，早已无意事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辑佚、校勘和金石学方面。正如蔡元培在鲁迅去世后所总结的：“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②他的这段抄书辑古生活，其实也不妨理解为“穷愁著书”。

鲁迅自己倒也说过，“古人所谓‘穷愁著书’的话，是不大可靠的”（《“碰壁”之后》）^③。所谓“穷愁著书”，一方面当然是为了沉寂度日。鲁迅后来主张“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就在于“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④。但光看到或强调这一面，也是有欠公允的。鲁迅毕竟师出名门，学术上的耳濡目染，使他不单循守清儒家法，而是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法门。所以蔡元培先生对他评价极高，认为“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著手”^⑤。有意思的是，1912年前的鲁迅积极用事，而1912年后近十年间的鲁迅倒更像个遗民——抄书辑古，孑然于世。他在民国元年的年底书帐上曾附注一笔，聊以自嘲：“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也可笑叹人也。”^⑥

① 钟叔河. 周作人文类编: 第10卷 [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 180.

② 蔡元培.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8: 270.

③ 鲁迅. 鲁迅杂文全集 [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152.

④ 鲁迅. 鲁迅杂文全集 [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135.

⑤ 蔡元培.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8: 270.

⑥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4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38.

周作人把归国后的鲁迅分为两期，“上期重在辑录研究，下期重在创作，可是精神还是一贯，用旧话来说可云不求闻达”^①。用“不求闻达”来概括鲁迅的辑录与创作，可谓知兄莫过于弟。即便是重在创作时期，抄书辑古仍然构成着鲁迅的一种不变的生活方式，以至鲁迅在被增聘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之后，与胡适的交往日见频繁起来。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革命”之初虽然一致联手对外，但并无甚交情；时过境迁，反在学术的酬唱中有了“知遇”之感，真是有趣得很。

关于“国学”，鲁迅的态度其实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偏激。1922年他相继写了《估〈学衡〉》《所谓“国学”》《“以震其艰深”》等杂感，可以看出他其实反感的只是“于旧学并无门径”的冒牌货，而对于真正国学家与真正国学书则是赞誉有加的——“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那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②（《不懂的音译》）。言语之中不难看出，国学在他心目中真正的地位。

当然，一再强调鲁迅的不求闻达、穷愁著书，并非有意削弱他在新文学中的启蒙地位。但有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即以鲁迅“勤苦作事”的作风，他作为“学者”的大贡献不应该只停留在一部《中国小说史略》上。真正把鲁迅从清寂书斋中赶出来的，只能说是1925年发生的女师大风潮。而次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更是直接将他逼出了北京城。自1926年7月底应厦门大学聘，担任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至1927年4月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在白云楼闭门不出，历时九个月。鲁迅这才真正意义上进入大学，堂堂正正做起了教授，名副其实当起了学者。所谓“堂堂正正”，是因为曾遭到过“教一两

① 钟叔河. 周作人文类编: 第10卷 [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 180.

② 鲁迅. 鲁迅杂文全集 [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124.

点钟的讲师”和“北大派”之类的攻击。鲁迅在“太学堂”兼课，有教授推出“教一两点钟的讲师”不配与闻校事的名论，以至有了《我观北大》中“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的声明。所谓“名副其实”，又是因为在女师大风潮时有人指责他“没有学者的态度”。对于“学者”这个“体面”的名称，鲁迅在文中多有调侃的意味。其实，对于真正学术或真正学者的真正态度，鲁迅在评价《流沙坠简》与王国维时已有表态，无须赘述。而对待不学无术的冒牌货，鲁迅一贯是很不屑的。他在《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中就“油滑”了一番：“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炖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那时我想：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所以，我看见回国的学者，头两年穿洋服，后来穿皮袍，昂头而走的，总疑心他是在外国亲手炖过几年牛肉的人物，而且即使有了什么事，连‘佛脚’也未必肯抱的。”^①这很让人联想起《藤野先生》一文中清国留学生的“标致”画像。

应该说，在学问上鲁迅是很看重真才实学，也是自视甚高的。除了已有的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他也说过，“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一定也可以说出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②。事实上，正是他的这种一贯的不肯迁就我行我素的“学者的态度”，让他总计不到一年的南下大学教习生活，变得非常糟糕：“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枝皮。”^③（《而已集·革“首领”》）这话写于1927年9月9日的广州白云楼，大有戏谑的意味。倘若把第二个“之后”置换一下，就更能体现出命运的乖舛了——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的还

① 鲁迅. 鲁迅杂文全集 [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190.

② 鲁迅. 两地书·原信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169.

③ 鲁迅. 鲁迅杂文全集 [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281.

是一个海边——上海。

“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①

这是鲁迅心迹自剖。身为“过客”的鲁迅，经历了从绍兴到南京，再从南京到东京；而后又返回绍兴、南京，再往北京的多重变故。所以才有了关于“歧路”与“穷途”的感慨。鲁迅避难厦门时的想法大致是教书，不过也有做点学问的念头。他所谓“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指的是后来未完成的《中国文学史》和根本来不及着手的《中国字体发达史》。1926年年末已辞职的鲁迅还致信李小峰：“你大约还不知道底细，我最初的主意，倒的确想在这里住两年，除教书之外，还希望将先前集成的《汉画像考》和《古小说钩沈》印出。”但厦门大学带给鲁迅的依然是失望：“此地很无聊，肚子不饿而头痛。我本想在此关门读书一两年，现在知道已属空想。”（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致瞿永坤信）“总之这是一个不死不活的学校，大部分是许多坏人，在骗取陈嘉庚之钱而分之，学课如何，全所不顾。且盛行妾妇之道，‘学者’屈膝于银子面前之丑态，真是好看，然而难受。”（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致韦素园信）学者们围绕着金钱大行妾妇之道，兼之人事的倾轧，让鲁迅非常失望。第二年年年初便转往广州中山大学。又因不满文学院院长傅斯年聘顾颉刚来校任教而辞职。可以说，正是对于所谓“学者”的一贯不屑态度，对于人事的不肯迁就个性，以及对于日趋体制化官僚化的大学大行“妾妇之道”的失望之情，注定了鲁迅的大学之路已走到尽头。在广州白云楼闭门不出的几个月，正是他面对歧

^① 鲁迅·两地书·原信[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5.